

# 冯特民族心理学的方法论及其当代意义

冯永辉<sup>1</sup>, 刘邦春<sup>2\*</sup>

(1.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长沙 410081;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航天部队航天工程大学基础部政治工作教研室, 北京 101400)

**摘要:**冯特晚年着力的民族心理学将研究对象从实验心理学所框定的个体研究拓展到了家庭、部落、社区等社会群体的研究,大量民族生活的精神产品构成了民族心理研究的对象。基于纵向与横向两种视角的历史产品分析法、心理现象类比法则成为民族心理研究展开的具体方法。从方法论视角来看,冯特的民族心理学研究体现出的是人文科学的学科定位、整体主义的研究原则以及主观的研究方法,乃是一种方法论上的主观范式。在今天心理学生物学化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审视冯特民族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考辨其历史价值,探讨该方法论对于当代民族心理学研究以及中国文化心理学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冯特;民族心理学;方法论;主观范式;中国文化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24)05-0393-08

## 1 引言

作为实验心理学(Experimental Psychology)最重要的开创者,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的心理学总是以一门极其严格的科学的面貌出现在心理学的教科书中,被看成是心理学客观范式(objective paradigm)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冯特的心理学远比人们所熟悉的要主观和多样一些,其晚年完成的二十卷《民族心理学》(Völkerpsychologie)便是运用主观方法的重要体现。冯特民族心理学的价值无疑是非常巨大的,被誉为是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的开端,宗教心理学(Religious Psychology)的重要里程碑以及人类学(Anthropology)的奠基之作。以致于《民族心理学纲要》(Elements of folk psychology)英文版译者爱德华·勒罗伊·施奇尔伯(Edward Leroy Schaub)称这本书为一部真正的不朽著作,他写道“也许我们可以大胆的预言,历史的最终定论将在于他……对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价值丝毫不比我们现在称之为早期的作品逊色”(Wundt, 1916)。

然而,施奇尔伯的预言似乎并不成功。在心理学发展的历程中,与冯特研究个体心理的实验心理学相比,他以群体心理为对象的民族心理学研究显得无足轻重,即使在心理学的人文取向逐步获得主流心理学的承认而在心理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今天,冯特的民族心理学研究也未因此而绽放出应有

的光芒。究其原因,除了通常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内容上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偏向以及方法上的主观性,致使该体系不符合科学心理学的纲领之外,对冯特民族心理学方法本身的认识不足以及对于当代心理学的方法论意义的审视欠缺,可能是最根本的原因(李静,侯小富, 2022)。

不可否认,冯特之后的学者们看到了他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在某些领域的重要价值,他关于宗教、语言、神话的精彩论述启发了许多后来者,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均从各自的视角拣择了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的一部分。然而,民族心理学自身却并未按冯特所筹划的那样发展。时至今日,“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但是它的一些元科学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对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学科特点均有过很多讨论,但均无定论”(张积家, 2016)。可见,很有必要从整体上就冯特的初衷所在即在与实验心理学同等地位的意义上,从与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之考察人类自然史的比较中,来考察和揭示冯特民族心理学方法论及其当代意义,进而回答当代民族心理学面临的方法论难题。

## 2 冯特的心理学体系及其理论逻辑

在讨论冯特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以及方法论特征之前,有必要系统回顾19世纪以来心理学研究方式的转变以及冯特的心理学体系,并就民族

\* 通信作者:刘邦春, E-mail: psyliu@aliyun.com。

心理学作为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一部分的理论逻辑与价值进行阐释。

### 2.1 冯特的心理学体系

自古希腊以来直至 19 世纪上叶,以哲学思辨的方式探究人的心理问题,如心理的起源、心理现象的分类、认知过程、情绪与意志、幸福感、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等等问题的做法,始终未曾受到质疑与挑战。在漫长的研究历程中所形成的、探究主观心理现象的内省法也广为流传。然而到了 19 中叶,借助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的客观实证方法探究心理逐步获得成功,以客观的方法揭示主观心灵的奥秘成为可能,实验法成功运用到对意识经验的研究之中。

冯特作为这一研究传统的先行者,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框定在可以实验的经验上,从而与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的形而上学的经验研究划开了界限。他主张心理是实在的,而不是实体的,心理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活动的,即人有一个真实而活动的心灵(波林,1981)。故心理学研究便可模仿物理学对原子的分析以及生理学对人体的还原,以实验法探求心理的元素及其组合(或活动)的规律。在实验法的运用上,冯特采用了内省法、反应时法在内的多种方法。他将实验法与内省法结合起来,运用实验条件来确保内省的客观性。对冯特来说,利用内省观察的第一条原则,就在于尽可能地捕捉偶然的、意外的和非常有意引起的经验。……最好是尽可能地依赖于记忆,而不是依赖于直接的领会……(詹姆斯,2003)。源自于赫尔曼·冯·赫尔姆霍茨(Herman von Helmholtz)由弗朗西斯科·康尼留斯·唐德斯(Franciscus Cornelius Donders)所确立的反应时的测量方法也为冯特所用,他的实验室的早期研究大约 20% 是重复或扩展唐德斯有关反应时的研究(赫根汉,2020)。

不过,冯特此处所讲的心理,指的乃是个体心理,是通过感知觉和注意等低级心理过程反映出来的。在他看来,人的群体心理,则只能通过记忆、思维等高级心理过程得以反映。高级心理过程的本质可以从诸如宗教、社会习俗、神话、历史、语言、道德、艺术和法律等精神产品(mental products)的研究中推论出来(赫根汉,2020)。这些精神产品不是个体可以创造的,也并非个体心理的简单相加,而是在群体活动中创造的产物,用于个体心理的实验法也就无能为力了。因此,以精神活动的整体为研究对象

的民族心理学,属于人文科学的一部分。

### 2.2 民族心理学的理论逻辑

按照奎纳尔·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和尼尔斯·伊耶(Nils Gilje)的说法,19 世纪新兴的人文科学面临两种策略,一是设法阐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是对普遍规律的说明而赋予它们自然科学的地位,二是寻求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对象上的异质性而赋予人文科学合法性(希尔贝克等,2012)。如果说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和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强调历史学研究的个体性原则和“客观统一精神”可以被看作是上述第一种路线的话,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和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则突出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在对象与方法上的迥异之处。德罗伊森首倡“人文科学”并凸显了理解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狄尔泰更进一步,他将生命看作是人文科学的先在条件,生命是在文本中被客体化的,故整个“人文科学”的研究皆以对生命的理解为基础(吕和应,2012)。鉴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在对象上的诸多不同,如自然科学研究物理现象、区别于常识与日常经验、基础要素同质性、具有一般规律性以及重事实忽略价值等,而人文科学强调“精神客观化”、源于常识与日常经验、基础要素具体化、具有个别丰富性以及重视价值研究,狄尔泰主张人文科学应有其独有的方法论,即理解。理解不仅是人们达到正确理解本文的重要手段,而且是人进入精神世界、历史世界、获取关于社会—历史现实的有效知识的唯一途径。

尽管人文科学的概念有诸多模糊之处,且无法清楚界定其涵盖的学科范围(张庆熊,2009),但却对此后的心理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描述心理学、整体心理学、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从中找到了自身存在的合法依据,上个世纪末兴起的质性研究方法则从中找到了思想源头,“甚至可以说,狄尔泰的描述心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早期的质性心理学”(王申连,郭本禹,2013)。这一历史影响的产生不仅在于狄尔泰将心理学列为人文科学的首要学科,从而彰显了心理学自然科学属性之外的人文科学属性,更重要地是,他回应了一个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对人类群体精神生活加以研究。

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体的和独特的东西,

个人是一个较大整体(家庭、社区/城市、社会)的一部分(希尔贝克等,2012),因而个体的心理生命依赖或内嵌于一个置身于历史的既定社会的客观精神,即一个社会群体或一个时代在语言、宗教、神话、习俗以及法律、道德和组织中所表达的文化精神……理解社会文化和历史产品的丰富内涵是对一个人的心理生命进行描述和分析的基础(王申连,郭本禹,2013)。可见,对人类共同的精神生活的研究,不仅是个体心理研究的必要延续,还是理解和解释个体心理生命的前提。如此,民族心理学不仅是人文科学的一部分,还构成了人文科学的基础。

### 3 冯特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如上所述,作为人文科学的民族心理学研究需要特定的研究方法。在冯特看来,适用于个体心理学的实验方法面对民族心理无能为力,只能通过对这些精神产品如语言、神话和宗教仪式等的直接观察来完成。由于这样的观察是在对源于人类学、民族学等资料的历史分析与比较中窥见人类群体心理的演化过程与分化形式的,故又被称为历史产品分析法(method of historical product analysis)或文化产品分析法(method of culture product analysis)。同时,冯特看到了个体心理现象与民族心理现象在结构上具有类似的特征,从而将个体心理与民族心理进行类比,这一研究方法则可以称之为心理现象类比法(method of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analogy)。

#### 3.1 历史产品分析法

一般认为,冯特主要采用分析(analysis)与综合(comprehensive)的方式,从纵向与横向两种视角来处理历史资料。分析与综合是思维的两种基本形式,二者相互依赖,相辅相成。按照《中国百科大辞典》的解释,“分析是思维把客体分解为各个部分……包括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因果分析等,综合是思维把被分解的各部分组合为统一的整体……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深化,……二者的基础是实践,正确的分析与综合必须建立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基础之上”(袁世全,冯涛,1990)。将民族精神分解为语言、神话、风俗等精神产品,继而考察各精神产品的发展史,可以看作是采用纵向“分析的研究方法”,而对某个特定历史阶段中精神产品的整体研究,则以横向的“综合的研究方法”进行。冯特的《民族心理学》第十卷就是运用“综合的研究方法”的具体体现(刘恩久,1979)。

通常的做法是先将团体生活(包括语言、艺术、

神话与宗教)中的重要现象逐个选择出来,然后用基础心理学研究个体心理的方法,分析这些现象的发展历程……对一些深入细致的分析来说,这是最直接的方法(Wundt,1916)。这种纵向分析的优势在于,可对某个精神产品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入研究,但却无法勾勒出心理发展的全貌,故这种方法在人类群体心理发展早期阶段的研究中并不适用,因为在这一阶段,语言、艺术、神话与宗教等各种心理形式交错在一起,彼此难分。

适用于对人类群体心理发展的早期进行研究的方法是横向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在保留纵向研究方法的轮廓的基础上,将群体心理发展的全过程根据其具体心理现象的相关程度分为几个阶段,然后针对每个阶段的具体资料,对该阶段的群体心理与行为进行心理学的解释。冯特写道:“与其依次考虑民族心理的主要表现形式(集体心理,指语言、神话和道德体系),这项工作不如尽可能同步地研究这些现象,展示它们的共同条件和相互关系。即使是在从事我之前的任务时(采用分析的方法),我也越来越相信需要后一种程序作为补充。事实上,我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的首要目标必定可以通过综合方法达成”(Wong,2009)。

#### 3.2 心理现象类比法

类比(analogy)作为一种不同于归纳和演绎的推理方式,是人们根据对比所得结果,从两类不同事物或现象的某些相似或相同的属性与特点,推导出它们在其它方面也具有相似或相同的属性与特点。对冯特来说,家庭、国家和民族等人类群体都是由单个的个人所组成的,故民族心理遵循着与个人心理一致或类似的规律。因此,适用于个体心理现象的分类方法也适用于民族心理,譬如,个体心理现象可以分为感觉和情感以及统摄它们的意志,相应地,民族心理则由语言、神话(宗教)和习俗所代表(Egbert,2020)。“不同的心理现象都可以分类,归属于观念、情感和行为动机。如果要对民族心理的内容以比较满意的方式进行分类,我们必须根据心理发展的阶段把这些类型的心理现象挑选出来”(Wundt,1916)。

在冯特看来,各种感觉与情感通过创造性综合(creative synthesis)使得个体心理以整体的形式发挥作用,同样地,民族心理也遵循这一原理,不仅民族心理的各要素诸如语言、神话和习俗是个体心理综合的结果,而且整个民族心理也是创造性综合的

产物。根据冯特的说法,创造性综合体现了所有心理复合物的内在性质,以及这些复合物在个体心理中的所有相互联系,以一种严格类似的方式被重复,但在社区或民族心理生活的更高进化水平上,民族心理是这一原则在个人心理之外的延伸。由于个人的心理是以叠加综合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因此民族心理是综合的综合——它是一种创造性的新东西,不等于其元素的总和(Rieber,1980)。

在个体心理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上,类比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如同个体心理的发展是从儿童到青春期和成年期一样,民族的发展也有明确的阶段:从原始人到图腾时代,再到英雄与神的时代,最后实现人性或人道的发展。按照冯特的美国学生格兰维尔·斯坦利·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的说法,儿童的生理发展连同他们的游戏、技艺和社会行为都是对人类发展阶段的复演(霍瑟萨尔,2013)。

#### 4 冯特民族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特征

在方法论上,主观范式(subjective paradigm)是指主张保留心理学的主观对象及与之相适应的主观方法的心理学方法论主张,意识心理学将意识作为研究对象,内省法作为主要方法,精神分析以无意识现象为研究对象,梦的分析为主要方法,人本主义心理学以需要、动机、价值等为主要对象,以内省、理解等为主要研究方法均是主观范式的体现(冯永辉,2017)。如果说冯特的实验心理学是一门囊括了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综合心理学的话,那么采用主观研究方法的民族心理学则是彻底的主观心理学,属于心理学的主观范式。

##### 4.1 人文科学的学科定位

与狄尔泰将整个心理学看作是人文科学不同,冯特认为实验心理学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只有民族心理学隶属于人文科学。就其研究对象而言,民族心理学定位于人类的高级心理过程,其负载于包括语言、神话、宗教与风俗等群体生活的各种精神产品之中。这些精神产品,不是单个人创造的,而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印迹,也是解读民族心理、进而理解婚姻、道德与宗教起源和发展的重要文本。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心理学构成了人文科学的基础(Wundt,1916)。

冯特关于民族心理学的本意最初与莫里茨·拉扎鲁斯(Moritz Lazarus)和赫尔曼·斯塔恩塔尔(Heymann Steinthal)是一致的,即建立一门独立于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学科,即使它来自于人

类学和历史学的人类社会群体活动的资料为研究对象,这门学科将因为对这些资料的心理方面的考察而不同于上述学科。就其最终未能以一种独立学科的形式出现来看,这种努力无疑是失败的,但就冯特民族心理学研究所涵盖的研究内容以及方法来看,其人文科学的学科定位及其研究体系,先为人文心理学的早期奠基,后为文化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另一种形式。

##### 4.2 整体主义的研究原则

在心理学史的教科书中,冯特通常被看作是元素主义者,铁钦纳的构造主义心理学则被看作是对冯特的思想的继承。Blumenthal(1975)在进行了系统考辨后指出,冯特并非构造主义的发起人,元素一词的用法以及冯特思想在翻译和传播过程中的扭曲是造成这些误会的源头。实际上,在冯特看来,感觉与情感是不可还原的意识的基本单元,它们不是呈现给我们的有形之物,而是逻辑分析的抽象产物,只有通过创造性综合所形成的整体的心理经验才能被我们感知为具体的。作为统觉的一种特别形式,创造性综合意味着是当元素被注意到时,它们可以按照个人的意志来组合和重新组合,且组合在产生之前永远不能被经验到(赫根汉,2020)。按照Varshizky(2019)的说法,“冯特把创造性的综合能力等同于意志力,它有助于创造一种全新的精神现实,这种精神现实超越了其各部分的总和”。

如前所述,冯特还将这种创造性综合的原则从个体心理扩展到了民族心理的解释中。在冯特看来,民族心理是指整个民族的集体知觉、情感和意志。它描述的是构成任何民族心理学焦点的经验性心理事实,即民族的精神产品。不仅这些精神产品各自是无法还原或分割的,而且各种精神产品在人类生活的早期也是紧密关联在一起,无法分割的。“心理发展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的整体,把这个整体分割成一个独立部分会引起争议”(Wundt,1916)。作为各民族独有的群体智慧的结晶,必须从整体上加以研究,并且,语言与宗教、神话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民族发展的早期,往往融为一体,这也就决定了对民族心理特别是人类早期民族心理的研究,也必须从整体上展开。

##### 4.3 主观研究方法

在民族心理研究的具体方法上,如前所述,纵向分析与横向比较的研究方法,正是与冯特民族心理学的人文科学主张、整体研究原则相呼应的主观研

究方法。尽管冯特在描述婚姻与家庭、宗教、艺术、城市的起源并依次推论出各阶段民族心理特征时,参考了大量的文化人类学资料,但如何根据这些材料推论出各阶段的民族心理的特点,则是一个带有主观性的理解与解释的过程。以冯特特别强调的横向研究方法为例,该方法的重要一环是将群体心理发展的全过程分为几个连续的主要阶段。但划分依据显然无法客观地界定,因而各个阶段也就没有明显清晰的界限。如冯特自己所言,在划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主观的成分,因为心理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这就如同我们无法将个人生活划分为界限明确的儿童期、青年期和成年期一样(Wundt, 1916)。

分析与综合是定性研究中常用的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最开始正是源于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指的是以研究者个人主观经验为基础的理论思辨方法。虽然近年来已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并逐步形成了一套操作方法和检测手段,显现出与定量研究和哲学思辨不同的一些特点。但在当前心理学中,定性研究常常是作为定量研究的补充手段。恰如冯特在论及民族心理学与个体心理学之间的关系时的观点,“……没有个体心理学(一般称为基础心理学),就没有民族心理学。民族心理学是个体心理学的补充,为解释比较复杂的个体意识过程提供研究方法”(Wundt, 1916)。

总之,分析与综合除了被用以研究基本民族学资料、文献资料外,冯特也将这种方法作为实验心理学研究中对复杂心理过程的研究,即人们熟知的以实现内省的方式对感觉与情感的分析。如果说实验心理学中的心理元素分析有着主观性的嫌疑的话,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的历史产品分析法,究其实质乃是一种彻底的主观方法。

## 5 冯特民族心理学方法论的当代价值

全面考察冯特民族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过程,也是澄清对冯特的历史误会,确立其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历史价值,并从其方法论蕴含中阐释当代民族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进而构建中国文化心理学的进路的过程。

### 5.1 人类心理演化史的独特阐释

在心理学生物学化的时代背景下,认知神经科学取得的卓越成就让许多心理学家感到振奋,特别是研究方法与技术的进步,全面揭示人类心理与行

为的生理奥秘似乎指日可待。但是,从个体角度来说,心理与行为的生理机制的研究理论上可能会有穷尽的时候,而从整体上来说,人类群体的心理是否存在?如果存在,我们能够勾勒出人类整体的心理演化史吗?神经科学家可以解释人类高级心理过程发展的动力机制吗?(Wong, 2009)。

就达尔文进化论对于人类进化史的角度加以类比,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进化心理学的成果充分说明了人类个体心理的共同性与普遍性,作为对个体心理的创造性综合的群体心理,在理论上也必定是存在的。但对于第二个问题,似乎却是一桩悬案。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以及宗教学等对人类群体活动的历史演进与群体活动的形式与内容均有着各自的理解,其中不乏关于人类群体心理特点的深刻洞见,但距离整体上描述人类群体的心理经验及其发展尚远。正是这一点,成为拉扎勒斯、施泰因塔尔等人寻求独立学科的民族心理学的原因。至于第三个问题,希冀透过脑生理机制而不考虑社会因素在心理与行为塑造中的作用的作法已经招致了诸多批评(Wong, 2009)。

从整体上考察人类心理演化的进程,透过文化来观察民族心理特征,进而寻求人类在发展历程中心理或意识前进的脚印,一直以来就是心理学的重要主题。如同卡尔·荣格(Carl Jung)在东方文化中找到曼陀罗,意图解开集体潜意识的谜团,阿布拉姆·卡丁纳(Abram Kardiner)在文化人类学资料的基础上,探寻社会制度对人格的意义,而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基于人的存在本体需求,寻找当代社会中潜意识的秘密一样,冯特也努力从民族集体生活的文化印迹中寻求对(高级)意识活动的理解与解释。可以说,正是在冯特的努力之下,心理学才有了对于人类心理演化史的初步理解和解释。若就人类群体心理的演化附着于其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这一角度来看,他的民族心理学则以简明扼要的形式展示了一部普世历史,研究了人类从原始阶段到更高更文明阶段的规律性、渐进性变化(Egbert, 2020)。

### 5.2 人文心理学研究的基石

心理学中的人文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关于人的主体性和主观性的思想,近代则可以寻迹至现象学、解释学和存在主义的哲学主张。作为与科学心理学相对应的人文心理学,研究者们通常视狄尔泰的描述心理学以及弗朗

茨·克莱门茨·布伦塔诺(Franz Clemens Brentano)的意动心理学为开端。但冯特的民族心理学及其方法论对当代人文心理学的奠基意义虽有提及,却在张扬其在实验心理学上的巨大功绩时,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

早在1863年的《人类与动物讲演录》中,冯特就规划了其心理学的两大体系:基于实验法的个体心理研究(实验心理学)与基于历史产品分析法的群体心理研究(民族心理学),并在该书的第二部分讨论民族心理学的多个主题。虽然民族心理学最终未能以独立的学科形式出现,冯特的民族心理学也并未在心理学对科学客观性的狂热追逐中幸存,但冯特对心理学的两种体系的充分认识,则为人文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姜永志,2013)。当我们把视野放的更宽泛些,把心理学研究置于人这一宏大主题和对象的框架下,便可以发现,冯特的民族心理学以多种形式被发展和继承。历史学家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和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社会人类学家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均汲取了冯特的民族心理学中的某些思想。此外,作为十八到十九世纪之交的人文学科广泛争论的一部分,则开启了社会科学先河(Egbert,2020)。

### 5.3 当代民族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路径

冯特的眼中,民族心理学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一种将“民族”看作是因某种客观条件聚集在一起而具有共同的文化、语言、道德与历史的一群人,民族心理学旨在研究各民族在智力、道德以及其他心理特征之间的关系,……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是研究的重点……(Wundt,1916)。另一种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拓展到了家庭、部落、社区等社会群体,对这些社会群体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活动的整体加以研究。就他所区分的两种民族心理学的实际内容来看,第一种民族心理学中的“民族”一词的涵义更加接近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民族概念,而第二种民族心理学的“民族”一词,更加接近“民俗”。

显然,冯特所主张的民族心理学主要聚焦于第二种意义上的民族心理学。有鉴于其在心理学领域的巨大影响力,尽管他提出的实验法无法用于高级心理过程的研究这一论断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但部分研究者据此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只能采用主

观范式。以至于在当代民族心理学研究中,也存在这样的认识,成为“民族学的民族心理学”与“心理学的民族心理学”在学科性质、研究取向、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分歧的根源(徐黎丽,2002)。实质上,就冯特对民族心理学的分类来看,第一种意义上的民族心理学,与当代跨文化(或跨种族)心理学研究在对象与方法上诸多重叠,主要采用通行于跨文化心理与行为研究的客观范式。第二种意义上的民族心理学,其“民族”概念,则与“实验心理学”的“个体”概念相呼应,与当代文化心理学及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在对象与方法上类似,主要采用主观范式。

当代民族心理学以民族心理现象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胡平,张积家,2016),既涵盖了对各民族的个体心理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又包括了对各民族整体心理特征的研究,既要探究某个民族在心理与行为特征上的独特性,又要追寻各民族共有的心理特征与行为习惯(尹可丽,张积家,2021)。研究对象的此种属性,决定了民族心理学在方法论问题上须采用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原则。由此,无论是主流心理学中通行的客观范式,抑或是民族心理学中长期以来奉行的主观范式,均有其合理发挥的空间,未来民族心理学在方法论上,应是主观范式与客观范式从消解对立到补充融合的过程。在此意义上,建立一门将传统民族心理学与实验研究的元科学相结合的专门化的民族心理学,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蒋柯,张凌雁,2015)。

### 5.4 对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启示

构建基于辩证唯物主义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心理学体系是当前时代最重要的心理学命题,在心理学生物学化、中国心理学研究落入世界心理学的跨文化支流(意指西方主流心理学的理论、方法与术语体系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验证与传播,致使哪怕是来自于中国本土实践的思想与方法,也要转由西方心理学加以体系化,复成为中国心理学研究和实践的依据)的背景下,在心理学基本概念未澄清、心理学知识体系混杂、心理学研究缺乏独创性等现实情境下,要达成上述目标绝非易事。

中国古代曾是世界心理学思想最早策源地和丰饶产区之一(潘菽等,1980),传统文化中蕴含了极其丰富的心理学思想(童辉杰,2015),不仅如此,中国是一个包括了五十六个民族的民族大家庭,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诸多举世闻名的成就,基于

中国人这一群体的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史料,如在语言、神话、风俗、宗教等方面的丰富成果。亦即,中国传统文化为开展冯特所说的第一种意义上的民族心理学研究提供了丰饶的土壤,“在他的《民族心理学》许多资料中,涉及到文化、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所有各个方面的事实材料,都可以在我国原始的社会经济和氏族的残余中、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历史过程中,奴隶制和封建制以及原始的家庭制度、婚姻、图腾制度、宗教、法律、道德、文艺中发现”(张世富,1991)。

据此,建设中国文化心理学可作为中国特色心理学体系建构的重要途径。根据汪凤炎(2017)的看法,中国文化心理学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和底蕴,兼顾中国文化与心理学两个角度来研究中国人心理与行为规律的一门心理学分支学科。……它关注于两个主题:一是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个体在心理与行为上如何长成中国人?二是长成中国人……后个体所具有的重要心理与行为规律。”换句话说,中国文化心理学不仅要勾画出中国人个体心理进化史,还要探讨当前中国人个体心理与行为规律。实质上,中国文化心理学这一个概念还内涵了第三个主题,即勾画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发展史。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化心理学从内容上不仅包含了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宗教心理学研究以及中国文化背景下心理人类学研究,还包含了汉语及各民族语言的语义特征及其发展与传播的轨迹、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的神话传说以及各民族的习俗特点的研究等。散落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宗教学等多个领域的心理学工作者将在中国文化心理学这一主题下荟聚,跨文化心理学、文化心理学以及本土心理学亦将在这一主题下统合。

当然,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构建并非一蹴而就的。李其维(2019)提出了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三个层次并指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心理学(第一层次)有自己独特的范畴体系,甚至独特的研究对象,但我国当前的心理学停留在第三层次,即对象与范畴仍然(与西方心理学)高度一致,但每一范畴都有中国文化的解释,他认为当前中国心理学工作者可在第二个层次上发力,即研究对象与西方心理学一致,但有自己的独特范畴体系,如对唯识学的研究。就此来看,民俗的心理分析(刘毅,1994)、汉语的语义分析(汪凤炎,郑红,2010)以及中国特色宗教心理学研究(陆丽青,陈永胜,2023)等不失为朝向这一目标

的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 参考文献

- 波林著.(1981).实验心理学史(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
- 冯永辉.(2017).客观之路:心理学主观范式与客观范式的历史反思.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赫根汉.(2020).心理学史导论(郭本禹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胡平,张积家.(2015).学科比较视角下民族心理学的研究理路与发展趋势.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51-58.
- 霍瑟萨尔.(2013).心理学史(郭本禹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
- 蒋柯,张凌雁.(2015).实验民族心理学的理论建构论纲(一).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83(3),94-100.
- 姜永志.(2013).西方心理学质化研究的人文精神及其发展轨迹.心理研究,6(5),8-16.
- 李静,侯小富.(2022).Wundt民族心理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3(8),205-215.
- 李其维.(2019).心理学的立身之本:“心理本体”及心理学元问题的几点思考.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7(3),1-21.
- 刘恩久.(1979).评冯特《民族心理学》中论国家、社会的问题:为中国心理学会第二届年会(1978)而作.四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0-16.
- 刘毅.(1994).论民俗及其心理分析的可能性与途径:民族心理学研究的新视角.贵州民族研究,57(1),47-52.
- 陆丽青,陈永胜.(2023).关于中国特色宗教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思考.科学与无神论,2,63-70.
- 吕和应.(2012).德罗伊森的“历史理性批判”.学术研究,12,93-98.
- 潘菽,陈立,王景和,陈大柔.(1980).威廉·冯特与中国心理学.心理学报,4,367-376.
- 童辉杰.(2015).中国心理学的困境:中国文化的救赎.心理技术与应用,1,3-8.
- 汪凤炎.(2017).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意义、内涵与方法.江西社会科学,37(9),5-13.
- 汪凤炎,郑红.(2010).语义分析法: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的一种重要方法.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4,113-143.
- 王申连,郭本禹.(2013).狄尔泰的描述心理学及其历史效应.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31(3),49-55.
- 希尔贝克,伊耶.(2012).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上下册)(童世骏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 徐黎丽.(2002).关于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6,95-110.

- 尹可丽,张积家.(2021).中国民族心理学百年流变与前瞻.  
民族教育研究,32(6),47-57.
- 袁世全,冯涛.(1990).中国百科大辞典.华夏出版社.
- 詹姆斯.(2003).心理学原理(田平译).中国城市出版社.
- 张积家.(2016).论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的十种关系.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44-50,189.
- 张庆熊.(2009).维特根斯坦对“说明”和“理解”的重新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8(2),5-11.
- 张世富.(1991).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昆明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3(3),34-45.
- Blumenthal, A. (1975). A Reappraisal of Wilhelm Wundt. *American Psychology*, 30, 1081-1088.
- Egbert, K. (2020). *Völkerpsychologie in 19th - Century Germany*; Lazarus, Steinthal, Wundt. *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243-263.
- Rieber, W. R. (1980). *Wilhelm Wundt and the Making of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Editor Plenum Press.
- Varshizky, A. (2019). In the Shade of Wilhelm Wundt: *Völkerpsychologie* and its Influence on National Socialist Racial Theory. *Moreshet*, 16, 369-402.
- Wundt, W. (1916). *Elements of Folk Psychology: Outlines of a Psychological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nkind* (Translated by Schaub). Routledge.
- Wong, W. C. (2009). Retracing the Footsteps of Wilhelm Wundt: Explorations in the Disciplinary Frontiers of Psychology and in *Völkerpsychologie*. *History of Psychology*, 12(4), 229-265.

## The Methodology of Wilhelm Wundt's *Völkerpsychologie*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Feng Yonghui<sup>1</sup>, Liu Bangchun<sup>2</sup>

(1.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2. Fundamental Department, Spa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PLA, Beijing 101400)

**Abstract:** Wilhelm Wundt's *Völkerpsychologie* extends the research object from the individual study framed by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to the study of family, tribe, community and other social groups, with the intention of analyzing the spiritual activities displayed by these social groups as a whole, and seek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explanation of conscious activities in the cultural blot of folk collective life. Cultural products such as religion, social customs, mythology, history, language, morality, art, and law are the object of *Völkerpsychologie*.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perspectives of historical product analysis and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analogy as the specific methods of *Völkerpsychologi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his research reflects the subject orientation of human science, the research principle of holism and the subjective research method, which is a methodological subjective paradig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ologicalization of psych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Wundt's methodology of *Völkerpsychologie* and discuss its historical value, and discuss the inspiration of this methodolog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psychology.

**Key words:** Wundt; *Völkerpsychologie*; methodology; subjective paradigm; Chinese cultural psychology